



两会速递

央行：无计划发行大额纸钞

12日上午，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，央行在决定是否发行大额现钞的时候，需要把利和弊统筹起来考虑，虽然大额现钞会给大额交易带来便捷，但也会随之带来许多问题，所以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计划在近期就发行500元或者1000元大额钞票的计划。

谈及中国央行发行大额钞票的可能，胡晓炼表示，关于是不是要发行大面额的现钞，我们也注意到老百姓有一些议论，在从事大额交易的时候，特别是买大件的时候，现在钞票的面额比较小，需要拿一捆去，不太方便。同时还有携带的便利问题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，如果挺远的，需要带的钱比较多，要是钞票的面额比较大，携带起来会比较方便，这就引发了是不是可以发行一些大面额现钞的要求。

此外，胡晓炼强调，发行大额现钞也有一些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，比如大额的票子，用在小额交易的时候就不太方便，特别是在找零的时候，又会产生一大堆零钱。另外，大额的现钞，如果发生了伪钞、假钞，持有者的损失确实会比较大。过去，一些出租车司机，还有一些零售商，由于收到了百元假钞，找出去是真钞，损失比较大，老百姓对此也有一些担心。第三个担心就是一些心理的因素，因为一般大面额的货币发行出来以后，老百姓是不是会有一些通胀的预期，对票子是不是会担心。



3月12日，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、副行长胡晓炼、副行长刘士余、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就“货币政策及金融改革”回答记者提问。这是周小川进入记者会现场时被记者包围。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

因此，胡晓炼指出，我们在决定是否发行大额现钞的时候，需要把利和弊统筹起来考虑。至于大家说的交易便利性问题，现在的电子支付制度，像信用卡、银行卡这些已经在很

大程度上能够解决现钞的携带问题和大额交易的便利性问题。所以，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计划在近期就发行500元或者1000元大额钞票的计划。 (据新华社电)

基层声音

月收入7500元为何没有安全感？

——基层代表委员建言“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”

两会期间，一则“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没有安全感”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。一些代表委员认为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境况和心态。

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。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，如何做大的“中等收入群体”？使收入分配格局从“金字塔形”向“橄榄形”过渡？

减负：如何将高昂的生活成本降下来？

小姚在北京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作，每月收入约7500元，扣除五险一金和个税后，每月实发约6500元，再除掉房租、伙食费和交通费，生活必需开支，每月积蓄不到2500元，他说生活在北京没有安全感。

租住在蜗居，出门挤地铁，买房是奢望……小姚的感慨引起许多上班族强烈共鸣。全国人大代表、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指出：“这反映出我国中等收入者非常脆弱，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较少，生活负担压力较

重。” 何为中等收入者？专家认为应具备中等以上收入、生活比较富裕、生活水平比较稳定。中等收入者不应该是“房奴”“车奴”“孩奴”。但现实中，住房、教育、医疗和养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，扼杀了城市工薪阶层积累财富的能力，制约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。

“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成熟社会的中坚力量，是消费社会的基础。这个群体应该是富有活力的，但是现在，他们陷入了某种群体性焦

虑。”易敏利代表说。 “做大中等收入群体，首先要织密社会保障网。”来自云南省昆明市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杨明说，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主要覆盖低收入群体，中等收入群体享受不到城乡低保、保障性住房等政策。他建议，政府要切实加大调控房价、稳定物价、推进教育公平、深化医改和完善社保等方面的力度，为中等收入群体“减负”，建立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社会保障体系。

增收：如何让“两个提高”从概念变成政策？

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去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，同比增长8.4%，低于GDP增长9.2%和公共财政收入增长24.8%的幅度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9118元，比平均数低2692元。

“这组数据表明，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

入分配中的比重还在降低。同时，大多数城镇居民收入在平均水平以下。”来自四川一家民营企业的全国人大代表王麒认为，改革开放30多年来，我们告别了“共同贫困”，但远没有达到“共同富裕”。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(海南)改革发展研究

院院长迟福林建议，抓紧制定并尽快出台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”，明确改革目标、任务和路径。关键是在顶层设计上落实“两个提高”，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，使“两个提高”从概念变成政策。

统筹：如何通过“调高”“提低”达到“扩中”效果？

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调高、扩中、提低的改革方向。这三者是有关联的，调高和提低都能起到扩中的效果。”易敏利代表说，“调高、扩中、提低”需统筹推进，打出“组合拳”。包括调整部分垄断行业尤其是高管人员的过高收入，提高个税起征点，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。

“受成本、原材料、融资和劳动力等各种因素影响，我国中小型和微型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

分行行长许海说，中小微型企业创造了80%以上的就业岗位，必须切实给小微企业“解困”，才能创造持续增长的就业机会，才能为工薪阶层提供更高的薪酬水平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王明辉提出，“结构性减税”对缩小收入差距等具有重要意义，应当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财政政策，对结构性减税制定一揽子计划，明确路径图和时间表。还有代表建议，继续大幅度

提高小微企业的营业税、增值税起征点，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5000元。 “普通工人工资水平为何上不去？因为最低工资标准定得低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四川东风电机厂工人王品盛表示，“希望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，把更多财富分给一线劳动者。” “扩中不能仅在收入上调节，更重要的是在机会上调节，畅通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渠道。”王麒代表说。 (据新华社电)

代表建议

完善保障房退出机制 防止开豪车住保障房

针对一些地方出现开着豪车住保障房的怪现象，代表建议应建立和完善保障房退出机制，严格规定住房保障对象的进入、退出条件以及相应的管理办法，做好落实与监督工作。对以虚假资料骗购保障性住房的，一经查实，立即责令退还或退出，并取消其5年内再次申请购买或租赁保障性住房的资格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陕西省政协副主席、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卫健说，我国保障性住房体系主要包括经济适用房、廉租房、公共租赁住房与棚户区改造等。当前这一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，严重影响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居住权利保障，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运行产生了深层次的问题。

对于保障房存在的问题，周卫健建议，目前我国迫切需要制定出符合国情的统一住房保障政策法规，从立法层面上界定住房保障的对象、保障标准、保障水平、保障资金的来源以及建立专门管理的机构等。

周卫健还建议，由国家组织银行、税务、电信、工商、公安、民政、建设、房产等部门，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信用制度。在保障性租赁住房方面，政府实时跟踪享有保障性住房家庭的收入信息变更情况，一旦受惠家庭的经济情况超出申请标准，已经有能力独立解决住房问题，政府就必须回收其租赁房或终止对其的租赁补贴，从而可以有效建立保障性住房退出机制。

周卫健说：“住房保障对象经济状况发生变化，不再符合保障条件，或购置、租赁、继承、受赠其他住房的，应按规定退出。对在规定期限内未退出保障性住房的，可以通过提高租金等方式实现退出。对廉租对象不再符合廉租保障条件，但仍符合经济适用住房条件的，也可以以廉租住房建设成本价或回购价销售的方式实现退出。对拒不退出的，应强制执行。”

周卫健还建议应从保障性住房的规划、建设、分配、推出等一系列运营中，对其中的违规与腐败建立严厉的惩罚力度与机制，甚至可以追究保障房的住户及其相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。 (据新华社电)

发言集锦

“不是修几栋高楼就叫城镇化，不是把农民叫进城就叫城镇化。”

——全国人大代表、贵州省黔东南州州委书记陈鸣明

“现在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愿意扎根在城市，政府部门应当用更加开放、包容的心态来看待他们，本地市民对他们也应尊重。”

——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

“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成熟社会的中坚力量，是消费社会的基础。这个群体应该是富有活力的，但是现在，他们陷入了某种群体性焦虑。”

——全国人大代表、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易敏利。

“做大中等收入群体，首先要织密社会保障网。”

——全国人大代表杨明

“想让干部舍不得大家的钱，办法很简单，就是公开透明，接受监督。村里事是大家的事，钱是大家的钱，权力必须在大家手里。”

——全国人大代表、河南濮阳县西辛庄村党委书记李连成

“行政权力高度集中，看似可以高效率，但很容易产生长官意志、主观主义和行政乱作为。”

——全国人大代表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应勇

“只有做到公平分配，使该保障的群众真正受益，防止不符合条件者侵占保障房资源，才能实现政府投入大量财力人力保障基本住房需求的政策初衷。”

——全国人大代表、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杨洪波。 (据新华社电)